

多元少数民族共同聚居的中产阶级郊区，还有城市中心区的族裔聚居区和贫民窟。这些不同的迁入环境并非总是有利于移民后裔的成长，有些环境即使适合第一代移民，也未必适合他们的子女。而融入美国社会所经历的不同社会环境和自愿或被迫选择的不同路径，对同化的多元结果——上向、下向或平向社会流动——都有可能影响甚大。对那些原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移民来说，下向流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流动，不如说是原地踏步，因为他们已经在最底层了，这种下向流动结果是新移民第二代的向下同化。据此，分层同化论可以让我们提出或继续思考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一些族裔的移民群体会陷入向下同化的路径，甚至长久地、世代代地被困在社会底层，而另外一些族裔的移民群体则能够避开这种悲剧性歧途？

【论 文】

跨国主义的实践与移民祖籍国的发展： 美国墨西哥裔和华裔社团的比较¹

阿列汗德罗·波特斯² 周敏³

摘要：无论在经济学或社会学学界，以往有关发展学（development studies）的研究大多注重跨国资本流动和投资行为等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强调行政制度和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过去有关国际移民的研究不仅将人口跨国移动这一现象归咎于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也同时视之为影响国家不发达的结果。近年来对于移民国际汇款的研究开始注重微观的理论视角，强调移民个体和家庭的能动性。然而，这种在研究视角上的转变对于研究国际移民与祖籍国发展的关系显然是不足的，因为它并没有考虑到移民群体自身所产生的组织和结构方面的效应，也没有考虑到在移民社团组织与祖籍国政府之间日益增长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促进发展的合力。本文的目的旨在深入探讨这一论题。我们通过最近刚完成的对美国墨西哥裔和华裔两大移民社团的比较研究，描述移民与祖籍国——墨西哥和中国——的地区及国家层面的密切互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对国际移民与祖籍国发展的因果进程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提出研究移民跨国主义的中层理论架构。与此同时，本文还讨论了此项研究在实践和决策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国家发展，跨国主义，移民社团组织，国际汇款，墨西哥，中国

一、导言

以往对于国际移民的研究大都着眼于输出地或祖籍国的“推力”（push）以及居住地或接收国的“拉力”（pull）的宏观因素，将人口跨国移动这一现象归咎于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也同时视之为影响国家不发达和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社会不稳定的负面的结果。一般而言，国际移民研究大多将移民个体作为分析基本单位。例如，古典经济学把个体视为是决定迁移行动和过程的主要决策者，而社会学以及新移民经济学则优先考虑家庭因素，把由个体组成的家庭作为

1 本文曾刊于《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1年第13期，1至29页。

2 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男，社会学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

3 周敏（Min ZHOU），社会学博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中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真正影响国际迁移的主要因素。反之，国际移民对祖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研究的¹。例如，对于移民国际汇款的研究注重微观的理论视角，强调移民个体的能动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关于移民跨国主义的研究也强调了这一理论取向，许多新流派把跨国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了移民个体与家庭上，通过对不同个案的分析，发现跨国活动的不同种类和形式以及接收国的移民社区（expatriate communities）与生活在祖国的亲友之间持续频繁的互动与联系的规律，包括移民定期汇款，定期两地往返并参与故乡的各类活动，以及与故乡亲友通过不同渠道进行交流²。

然而，以往对跨国主义的研究只强调移民如何融入接收国主流社会，不仅忽略了移民两地持续互动以及移民与故乡藕断丝连的关系对祖国发展的影响³，也忽略了影响移民与发展这对关系的第三个重要的行动主体——社团组织。以最近一项针对移民跨国主义的定量研究为例，该项研究把焦点放在移民家庭的户主上，用问卷访谈的方法考察了他们涉及祖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由此产生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其中一个发现是，持续参与跨国活动的移民个人在族裔群体中的比例并不高。一般仅限于年纪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在社区中较有威信以及在职业上有所建树的男性已婚移民。此项研究同时发现，移民个人的大部分跨国活动都是通过同乡会或类似的社团组织以及在祖国家乡的分支组织来进行的⁴。实际上，个人或家庭对祖国的影响离不开社团组织。此外，移民来源地家乡的民间组织和各级政府部门，也大多通过海外社团组织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移民个人为祖国发展做贡献的意愿和行动。既然社团组织这么重要，就有必要以组织作为分析单位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围绕移民跨国社团如何影响祖国的发展这一中心议题来探讨以下几个有关问题：移民社团中到底有多少是跨国组织？跨国社团产生的动因是什么？跨国组织社团倡议和发起的组织活动有哪些主要类型？涉及的范围有多广？社团的跨国活动是如何被祖国看待的——是接纳和支持、还是拒绝和反对，对祖国有何影响？

二、移民跨国主义研究

无论在经济学或社会学学界，以往有关发展学（development studies）的研究大多注重跨国资本流动和投资行为等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强调行政制度和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在过去，学界和政界倾向于认同有关国家发展是资本积累和投资的结果的古典经济学观点。而最近，学界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国家发展是制度完善的结果⁵。最频繁、输出移民最多的祖国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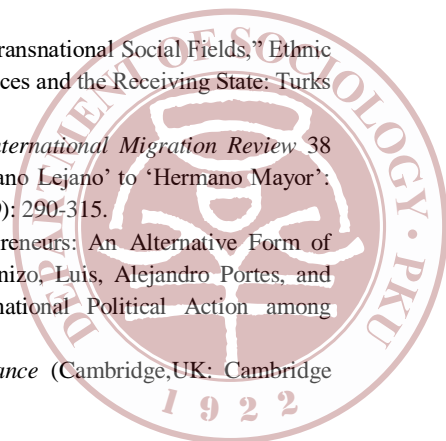
1 Brinley Thomas,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George Borjas, *Friends or Strangers: 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the U. S. Econom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8); Oded Stark, *The Migration of Labour* (Cambridge, UK: Basil Blackwell, 1991).

2 Nina Glick-Schiller and Georges Fouron, "Terrains of Blood and Nation: Haitian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1999): 340-66; Eva Ostergaard-Nielsen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Receiving State: Turks and Kurds i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Global Networks* 1 (2001): 261-281.

3 Steven Vertovec,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and Modes of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8 (2004): 970-1001; Patricia Landolt, Lilian Autler and Sonia Baires, "From 'Hermano Lejano' to 'Hermano Mayor': The Dialectics of Salvadoran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1999): 290-315.

4 Alejandro Portes, William Haller, and Luis E. Guarnizo,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An Alternative Form of Immigrant Adap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002): 278-298; Guarnizo, Luis, Alejandro Portes, and William Haller, "Assimil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Determinants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Action among Contemporary Immigra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2003): 1211-48.

5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过建立与海(国)外侨民相关的政府机构和项目来加强政府与移居国外的侨民之间的关系与沟通,这些祖国在涉侨政策的研究上比学界已经先走一步,在国家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方面以发展为目标,但结果却往往不尽人意,与预期结果背道而驰。人口外流,尤其是专业技术移民的流动引起的人才流失——所谓的“脑力外流”(brain drain)或“脑力枯竭”,被认为是国家不发达的一种症状而非原因¹。可是,关于国际移民如何影响国家发展的问题,无论在经济学还是社会学有关发展的文献中鲜有被关注²。

然而,移民国际汇款的急剧增长改变了传统的观点。官方报告显示,全球移民汇款总额从1980年的433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000亿美元³。2008年,全球发展中国家所接收的国际汇款高达3360亿美元,其中印度(490亿美元),中国(480亿美元),墨西哥(220亿美元)和菲律宾(200亿美元)成为收取移民国际汇款的大国⁴。曾几何时,许多移民输出国的政府发现,海外侨民为祖国带来的硬货币的总量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这些国家所接受的外国援助,而这些硬货币的总额甚至可以与国家通过商品出口所赚得的外汇媲美⁵。世界银行联合其他国际机构一起分析汇款流,并试图将这些汇款纳入生产性投资中。对于一些移民输出国来说,每年的侨汇在国民总收入中越来越显重要。侨汇收入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商讨外债时的抵押条件⁶。

与此同时,移民输出国政府还发现,除了国际汇款本身的直接经济效益,侨胞热衷于家乡的慈善事业并由此带来了数百万计的美金的金钱和物质捐赠。此外,侨胞还会将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回乡,教授乡亲如何经商、办工厂和发展地方工业⁷。这种汇款的大量流入实地输出国政府不断地意识到与海外侨胞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为了维持、鼓励、引导侨汇和捐赠,祖国的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推行涉侨优惠政策。然而,政府一般不会单独地与个人进行合作,而更多的是通过移民社团与其精英或代表展开合作。在当今学界发现移民社团在跨国主义进程中的作用的同同时,许多移民输出国的政府也把关注的重点从侨民个人转到社团组织之中。在此之前,跨国主义超越移民个体这种现象早已被学界从组织网络或社会网络的角度探讨过⁸。

University Press,1990); Peter Evans, "Development as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Pitfalls of Monocropping and the Potentials of Deliber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8 (2004): 30-52; Karla Hoff and Joseph Stiglitz, "Modern Economic Theory and Development," pp. 389-460 in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ited by G. Neier and J. Stiglit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 Alejandro Portes, "Determinants of the Brain Dra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0 (1976): 489-508; Lucie Cheng and Edna Bonacich, *Labor 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 Marina Ariza and Alejandro Portes "La Migración Internacional de Mexicanos: Escenarios y Desafíos de Cara a un Nuevo Siglo," pp. 1-51 in *El País Transnacional*, edited by M. Ariza and A. Portes (Mexico DF: IIS/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Press, 2007); Landolt et al., "From 'Hermano Lejano' to 'Hermano Mayor'."

3 Gammeltoft, P. "Remittances and Other financi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The Center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Copenhagen, March 2002); Luis E. Guarnizo, "The Economics of Transnational Liv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 (2003): 666-6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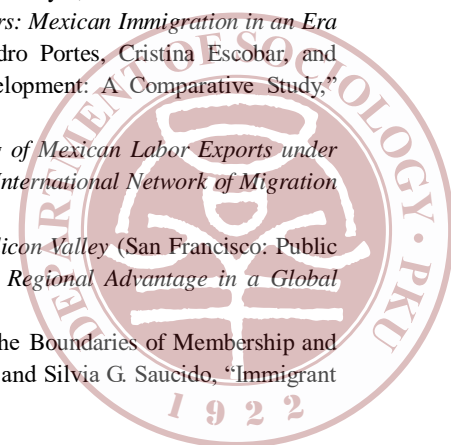
4 World Ban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12,"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Team,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April 23, 2010. [<http://remittancesgateway.org/index.php/factbook>] viewed on May 1, 2011.

5 Douglas S. Massey, Jorge Durand, and Nolan J. Malone, *Beyond Smoke and Mirrors: Mexican Immigration in an Era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2); Alejandro Portes, Cristina Escobar, and 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 "Immigrant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1 (2007): 242-281.

6 Raul Delgado-Wise and Humberto Marquez Márquez Covarrubias, *The Reshaping of Mexican Labor Exports under NAFTA: Paradoxes and Challenges* (Zacatecas, Mexico: University of Zacatecas,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6); Guarnizo, "The Economics of Transnational Living."

7 Anna Lee Saxenian, *Local and Global Networks of Immigrant Professionals in Silicon Valley* (San Francisco: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2002); Anna Lee Saxenian,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 Luin Goldring, "The Mexican State and Transmigrant Organizations: Negotiating the Boundaries of Memb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7 (2002): 55-99; Jose Itzigsohn, and Silvia G. Saucido, "Immigrant



目前关于国际移民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的研究文献还是十分欠缺的，有待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现有跨国主义的文献一般倾向于对各种国际汇款（remittances）的研究，而忽略了以社团组织为基础的更为广泛的互动形式的研究。无独有偶，有关跨国主义的文献仍停留在以个人或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描述性的个案研究，却没有重视以社团组织为基本单位的分析性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对移民社团与输出国政府日益频繁的沟通给予足够的关注。此外，并非所有祖籍国政府都鼓励或者参与到侨民的跨国活动中去的。国家力量比较弱或者办事效率不高的移民输出国仅限于允许国际汇款的流入，而并不积极支持或参与侨民及其社团的跨国活动。不过，近年来由于海外侨民为祖籍国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因而赢得了许多移民输出国政府的关注并把积极地支持和参与侨民跨国活动提到议事日程和决策过程中。同时祖籍国与侨民之间的联系也为移民群体在接收国新环境的适应和融入提供了新视野。在本文以下的几个部分，我们将讨论并比较两个个案，旨在探讨移民社团如何影响国家发展以及社团跨国活动所带来的启示。

三、研究方法

移民社团组织日渐明显的重要性促使我们对它们开展了一项系统性的实证研究。这个项目的研究重点在于深入了解美国主要移民群体社团组织的数量，种类，产生的原因以及活动方式和范围。在此之前，曾经有过一些相关的个案研究，为我们这个项目提供了充实的素材和理论根据。例如，格尔玲关于墨西哥裔移民联合会的研究以及兰朵尔特等人关于萨瓦尔多裔移民社团的研究¹。不过，迄今为止，对移民社团组织的调查仅限于个案的定性研究，面不够广，推广性不强，对社团组织的种类和功能变化更加鲜有知晓，更谈不上定量研究了。而我们的研究在调查设计上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列出各主要移民群体的社团组织清单以了解社团的种类和发展现状。我们首先借助族裔群体聚居的主要大城市的电话黄页、社区通讯录和社团网页列出清单，对社团的数量和种类进行整理。我们还有赖于移民输出国驻美的使领馆工作人员，社区精英以及专业线人的帮助和提供的其他社团机构的信息来完善清单。我们发现，每个移民群体的社团组织都很多，种类五花八门，有大有小。大型的社团一般有相对充裕的活动经费，拉美裔移民群体这类的社团组织大多由的联盟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组成，而华裔群体则大多由传统同乡会、宗亲会和堂会组成中小社团有一些能够经营很久，可大部分都是昙花一现。

第二步是对在社区知名度较高而且较稳定的社团的侨领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以了解社团运作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特别针对那些仅在居住国范围活动的和那些参与跨国活动的社团组织进行比较分析。在此过程中，我们按种类、规模和历史抽取样本，从每个移民群体中挑出三十至五十个社团组织作为问卷访谈的对象。我们假设那些最庞大最稳定的社团组织是最有可能在祖籍国实施发展计划并且最能够展开跟祖籍国政府的对话的。

第三步是田野调查，我们到移民输出国实地考察并访谈当地的有关政府官员，这些官员负责与侨胞社团以及美国相应的当地组织部门保持联系。在祖籍国的田野调查有双重目的：第一，检验受访的移民社团侨领所提供的关于在家乡的项目和活动的报告是否真实；第二，通过祖籍国的视角来完善一幅跨国主义的图景，即移民跨国活动对于祖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本文的重点在于系统地比较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的社团组织，他们来自有雄鹰之称的墨西哥和有巨龙之称的中国。在当今的美国，墨西哥移民是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移民群体，而且

Incorporation and Sociocultural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6 (2002): 766-798; Ostergaard-Nielsen, “The Politics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 (2003): 760-786.

¹ Goldring, “The Mexican State and Transmigrant Organizations”; Landolt et al., “From ‘Hermano Lejano’ to ‘Hermano Mayor’.”

这些移民对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自 1994 年通过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美国和墨西哥的经济唇齿相依。墨西哥成为为美国市场生产汽车与其他工业产品的重要平台¹。而华裔移民也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移民群体，是亚洲移民之冠。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也是相互依赖。在制造业和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中国是墨西哥的主要竞争对手²。在过去一百多年间，这两个国家同样经历了大量移民美国的过程。在过去三十年，他们同样对外开放经济，寻求外国投资和贸易。我们假定二者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水平以及在美国的移民历史和社团组织种类有所相似，这样就可以系统地比较两国移民社团组织的功能及其对于祖籍国发展的影响。

四、美国墨西哥裔移民跨国社团组织

上面提到，墨西哥裔移民是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族裔人口超过了一亿两千万，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在海外。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目前现状来看，墨西哥都储备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其强大的北边邻国，尤其是以季节性的流动为主。1964 年“布拉塞洛计划”（Bracero Program）的终结，导致了这种季节性劳工流动通过非法的渠道被重新激活，以至无证移民和非法入境迅速增长。如今，大约一半以上的墨西哥移民是无证移民³。

一般而言，墨西哥裔移民大多集中在美国西南部，三分之一聚居在加州，20%在德克萨斯州。中西部是他们的第二选择，有 7% 的人口住在伊利诺斯州。近些年来，墨西哥裔的劳工移民已经逐渐向东部转移，在农业和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寻找工作机会，从而逃避西部和西南部的边关收紧和反移民浪潮。现在，大量墨西哥裔人口开始出现在他们历史上未曾踏足过的地方。一些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例如纽约、新泽西、佐治亚和南北卡罗纳多州都接收了大量的墨西哥裔移民⁴。

1. 墨西哥移民社团组织

在很多重要方面，墨西哥移民社团组织与其他拉美裔的移民社团组织有所不同。墨西哥裔移民人口不但比来自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所有移民群体的总和要多的多，而且绝大部分的墨西哥裔移民都是来自农村⁵。墨西哥裔移民对自身祖籍地的传统忠诚比其他拉美裔移民要强得多。他们的社团组织与家乡的社团组织的发展不仅是相呼应的，而且比其他移民群体的社团发展更为长久化和多样化。还有一个显著的指标能说明这种差异：当其他拉美裔移民社团组织采取不定时的举行联欢会，靠抽奖、跳舞等活动的形式来筹款支援家乡建设的时候，墨西哥裔移民通常会定期捐款给他们的同乡会，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祖籍地履行传统责任（西班牙语为 *cargos*）的延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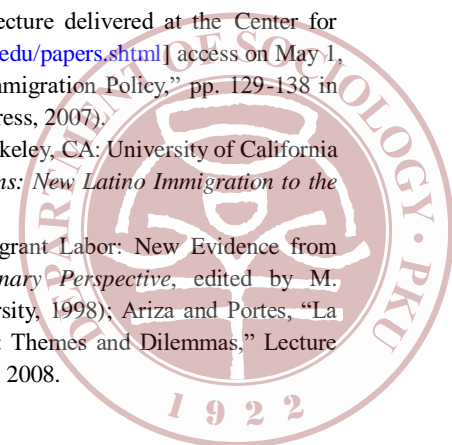
¹ Harvey Shaike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exico: A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9 (1994): 39-72; Delgado-Wise and Covarrubias, *The Reshaping of Mexican Labor Exports under NAFTA*.

² Susana Iranzo and Alyson C. Ma, “The Effect of China on Mexico-U.S. Trade: Undoing NAFTA?”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2006. [http://www.sandiego.edu/peacestudies/documents/tbi/iranzo_ma_TBI.pdf] access on May 1, 2011.

³ Passel, Jeffrey S. 2009. “The Economic Downturn and Immigration Trends,”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Center fo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March 26 [<http://cmd.princeton.edu/papers.shtml>] access on May 1, 2011; Douglas S. Massey, “Borderline Madness: America’s Counterproductive Immigration Policy,” pp. 129-138 in *Debating Immigration*, edited by C. M. Swa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⁴ Robert C. Smith, *Mexica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Worlds of New Immigrant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Fran Ansley and Jon Shefner, *Global Connections, Global Receptions: New Latino Immigration to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2009).

⁵ Wayne Cornelius, “The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of Demand for Mexican Immigrant Labor: New Evidence from California,” pp. 115-55 in *Crossings, Mexican Immigration i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edited by M. Suarez-Orozco (Cambridge: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Ariza and Portes, “La Migración Internacional de Mexicanos”; Patricia Arias, “Mexico’s Rural Agenda: Themes and Dilemmas,”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Center fo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April, 2008.



一是三个拉丁美洲裔移民群体中的移民社团组织的清单（我们的研究还包括了多米尼加和哥伦比亚移民群体的社团）。从表中可以看到，墨西哥裔移民社团组织不但数量繁多，而且很多都是属同乡会类型的（占三分之二）。相比而言，多米尼加裔的同乡会只占 3.5%，哥伦比亚裔的只有 2%。同乡会联合会一般是以来源地（州际）划分，墨西哥裔社团组织有 4%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而其他两个族群却没有这类型的社团组织。

2. 祖籍国的影响

祖籍国的国家因素是影响移民跨国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墨西哥联邦政府在跨国场域（transnational fields）中表现强烈而积极。联邦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成立海外墨西哥人事务办公室（西班牙文为 Instituto de los Mexicanos en el Exterior，缩写为IME），隶属于外交部，IME是国家力量达到顶峰的标志。2002年IME还成立了一个由来自北美142个移民社团的代表所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一些移民比较集中的墨西哥州（在中国称侨乡），例如萨卡特卡斯（Zacatecas），提倡在全美建立他们的同乡会联合会。萨卡特卡斯的州长，以及该主要城市的市长，州立委频繁地访问洛杉矶、休斯顿还有其它乡亲较为集中的美国城市并与移民社团组织建立密切的关系，当然，那些社团的精英分子也会定期回访墨西哥和侨乡各地。萨卡特卡斯州是积极支持和推行政府的1+3计划（tres-por-uno），曾经是1+2计划（dos-por-uno）。通过这个项目，移民社团组织每捐献1美金给墨西哥的公共事业，他们的联邦、州和市政府都要配套给予4倍的投入¹。据萨卡特卡斯州州长阿玛利亚·加西亚（Amalia Garcia）介绍，1+3计划已经支持了州内超过1000个发展项目。移民捐赠的资金都用在了修建课室、操场和道路中去了。最近估算大概有六十万萨卡特卡斯人住在美国，约占萨州人口的40%。这个1+3计划是将国际移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人口流失）转化成为促进地区发展的积极力量。加西亚州长还制定实施了“返乡人”（西班牙裔语为*Para los que Regresen*）计划，给萨州籍移民送回萨州念书的小孩提供奖学金²。

表一：美国拉丁美洲裔移民社团组织的类型

类型	族裔			总百分比 %
	哥伦比亚裔 %	多米尼加裔 %	墨西哥裔 %	
公民/文化组织	47	30		16.2
其它文化组织	10	15		3
经济组织				1
同乡会			60	47.0
同乡会联合会			0	3
州/省际同乡会				6
国际慈善组织（如 Lion Clubs, Rotaries, Kiwanis 等）				1
来源地慈善组织			0	0
政治组织		10		2
专业行业协会		14		3
宗教组织				0
社会服务组织		17		4
体育型组织			10	7
学生组织			0	1

¹ Goldring, “The Mexican State and Transmigrant Organizations”; Guarnizo, “The Economics of Transnational Living”; Rodolfo de la Garza and Miriam Hazan, *Looking Backward, Moving Forward: Mexican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as Agents of Incorporation and Dissociation* (Claremont, CA: Tomas Rivera Policy Institute, 2003).

² Jude Joffe-Block, “Immigration Viewed From the Other Side,” *Berkeley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10): 18-20.



总百分比	100.0	100.0	100.	100.00
总受访社团数	3	17	1,290	1,775

资料来源：移民社团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Immigrant Organization Project, 2008).

而在其他移民输出的州和县市，如哈利斯科州 (Jalisco) 和米却肯州 (Michoacán) 都采用了萨州的模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墨西哥移民社团组织的集中地，洛杉矶、休斯顿和芝加哥发起建立同乡会联合会。现在在很多新的墨西哥裔移民的目的地城市，在那里的墨西哥人也效仿了这种联合会的组织形式，以便于与来源地政府互动（移民个人和组织直接受到墨西哥领事馆与来源州政府的帮助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在纽约的墨西哥裔移民主要来自普埃布拉州 (Puebla)，因为历史上墨西哥裔移民不聚在纽约，那里的墨西哥裔移民大多是新移民和非法移民，他们在墨西哥领事馆和来源地州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组织起来，在纽约市建立了一个的普埃布拉社区 (Casa Puebla)。又如，自1994年起，瓜纳华托州 (Guanajuato) 的州政府已经帮助和支援了在美国的14个州墨西哥裔移民建起了45个瓜纳华托社区，其中有五个在美国东岸¹。

更重要的是墨西哥联邦政府在跨国场域中的表现。这表现在针对移民慈善捐赠所提供的匹配项目，例如近期的1+3计划 (tres-poruno program)，在美国许多城市的墨西哥裔社区，建立了为墨西哥人服务的图书馆、咨询机构以及语言培训中心（培训英语和西班牙语）。在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联邦政府还为墨西哥裔移民建立了一个拥有55个法律顾问单位的网络，并加强了IME对墨西哥移民在法律辩护上的援助。此外，墨西哥政府在使领馆里设立了“健康窗口”，给墨西哥裔移民提供了免费基本医疗服务和医学资讯。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决定这些跨国移民组织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是祖籍国政府对其移民社团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中，这种国家赞助极其少，而在墨西哥却很普遍。墨西哥社团组织得到来自祖籍国官方的赞助是哥伦比亚和多米尼亚社团组织的十倍²。这再一次反映出墨西哥政府深深地卷入其海外移民社区中间。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跨国社团组织成员的特点，这一点所有拉美裔移民群体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移民社团组织都是由年长的、教育良好并且较有威信的移民担任他们的领头羊。如表二的数据显示，大约有一半的常规成员都是40岁或以上的，而且至少拥有一个大学文凭。相反，只有五分之一或者更少的人是三十岁以下，拥有高中以下文凭的。然而，对比哥伦比亚和多米尼亚的社团组织，墨西哥社团组织相对更加能吸引年轻人，而且他们的成员中，高学历和低学历的人各占一半。总体而言，这与墨西哥裔移民人口中总体上年轻化和低人力资源化的特点相一致；同时反映了，贫穷的墨西哥移民对于农村老家的长期牵挂，这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加入了同乡会。此外，近70%的拉丁社团组织成员都在美国生活了十年或以上，其中有一半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墨西哥裔的移民社团组织中再一次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地方，从非法移民中抽取的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当中，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多于无证居民。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包括墨西哥裔移民在内的所有拉美裔移民中，更倾向于参加这些跨国的、政治的或者其他活动的，往往是那些在他们各自社团中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成员，那些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居民以及拥有合法地位或美国公民身份的移民。我们还发现，现在的移民都一般都希望在接收国的主流社会和劳动力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考虑集体目标的实现。而通过社团组织进行跨国活动，可以帮助移民在经济、文化与社会融入美国，而移民那种对祖籍国的发展作贡献的动机与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种考虑的。

¹ Cristina Escobar, “Migracion y Derechos Ciudadanos: El Caso Mexicano,” pp. 231-274 in *El País Transnacional*, edited by M. Ariza and A. Portes (Mexico DF: IIS/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Press, 2007).

² Escobar, “Migracion y Derechos Ciudadanos: El Caso Mexicano.”



表二：美国拉丁美洲裔移民社团组织成员的背景特征

	哥伦比亚裔	多米尼加裔	墨西哥裔	总百分比
年龄				
30岁以下(%)				
40岁以上(%)				
教育程度				
高中肄业(%)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职业				
劳动密集型蓝领职业(%)				
专业白领职业和业主(%)				
英文程度				
不谙英文(%)				
英语熟练(%)				
移民合法地位				
非法入境者(%)				
美国公民(%)				
在美居住时间				
少于五年(%)				
多于十年(%)				
因社团事务而往返祖籍国的频繁度				
从来没有过(%)				
每年至少三次(%)				
总数	3	17	1,296	1,775

资料来源：移民社团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Immigrant Organization Project, 2008)。

由此可见，墨西哥裔移民的跨国主义是与众不同的，这种差异不仅追溯到国家因素，墨西哥各级政府的介入对移民跨国实践的影响不可忽视。还追溯到其独特的移民历史，移民背景及其社会融入状况：美国墨西哥裔移民主要来自农村或原著民的村落，这些移民抵美后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体力工作。这些身份卑微并处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底层的移民不可能建立诸如莱昂斯俱乐部 (Lions clubs) 或者基瓦尼斯俱乐部 (Kiwanis clubs) 这些由哥伦比亚移民所建立的移民社团组织¹；他们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也使他们无法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的社区。不过，他们组织社团的意愿却丝毫没有减弱，而依靠着对家乡那种传统的忠诚和责任感联合起来，与他们的家乡保持着延续的和积极的联系，非法移民或无证居民虽然从来不去想去领导同乡会，但他们还是积极参与，将辛辛苦苦赚到的血汗钱贡献到同乡会中去，为家乡建设出力²。

3. 变动中的墨西哥裔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

墨西哥裔移民的跨国实践的效果可通过以下两个案例说明。案例一：过去十年间，来自萨州的圣胡安特洛同乡会会长阿曼多·费尔南德斯 (Armando Fernandez) 已经为他的家乡圣胡安特洛筹集了许多美金，以支持当地的公共设施建设。作为一个住在加州的土木工程师，费尔南德斯与其他同乡移民联合组成了一个协会以便更好地帮助建设家乡。他们最先开始在一所费尔南德斯以前上过的小学进行资助，而后还做了许多其他的捐赠。“我非常依恋我的家乡”，他说，事实上，

¹ Portes et al., “Immigrant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² Goldring, “The Mexican State and Transmigrant Organizations”; Bryan R. Roberts, Reanne Frank, and Fernando Lozano-Asencio, “Transnational Migrant Communities and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1999): 238-66; Maria A. D’Aubeterre, “Aqui Respetamo a nuestros Esposos’ Migracion Masculina y Trabajo Femenimo en una Comunidad Nahua,” pp. 513-546 in *El País Transnacional*, edited by M. Ariza and A. Portes (Mexico DF: IIS/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Press, 2007).

他已经是他家族中第四代经历跨国生活的移民了¹。

案例二：来自格雷罗州的圣米格尔（San Miguel Comitipla）同乡会，其成员大多是低技能的劳工和无证移民，主要聚居于纽约。这个同乡会的第一个跨国成就是在家乡的镇中央广场上建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凉亭。接着同乡会成员将镇上的教堂翻修一新，后来还买了一个大钟放在教堂的塔上，并陆续整修及用砖瓦重铺了通往广场的公路和街道。为了完成这些工程，移民经济上的支持和当地志愿者的劳动是缺一不可的。这个同乡会的下一个大工程就是扩建广场，以容纳镇上每年的从各地来的朝圣者，大约需耗资 8 万到 26 万美金。圣米格尔市的市长描述了跨国事业开始的情形：

“1985年前后，我们的小镇受益于这些工程。他们出于宗教原因修缮圣地亚哥的圣所，这里有许多移民资助者帮助我们；我们买了很多路灯，引向圣所——这条路是朝圣游行队伍的起点。今天，有赖于在美国移民的支持，我们的建设更近一步了：教堂的外观更好看了，神坛用金叶翻修；现在，我们期待来自市政府和我们在美国的同胞给我们更多的资助，重建这里的学校²”。

如前所述，墨西哥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全国上下参与其发展工程。在 IME 下辖的咨询委员会每年组织两次会议，与会者由从美加的移民社团组织中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的。通过美加两国的墨西哥委员，IME 提出了更加深入的倡议，就是保证移民在祖籍国所拥有的公民权和选举权，维护他们在海外的利益，促进其与祖籍国的持续联系。大量的国际汇款流入，以及同乡会及各种协会对家乡的贡献成为了推动政府持续参与国家建设的核心和推动力量。

五、美国华裔移民跨国社团组织

中国是美国所以移民群体中的最大的祖籍国。中国有13亿人口，为全球人数最多的国家，散居在海外的华人社会（diaspora），包括华人移民及其后裔，估计达到四千八百万，同样是居全球第一。而这些海外华人中大部分都集中在东南亚。而美国华人社会则是在亚洲之外最大的华人社会，也是接收华人移民最多的国家。现在美国华人人口达到三百六十多万，其中三分之二是国外出生的第一代移民，是除了墨西哥以外，在美国的最大的非欧洲裔移民群体³。

华人自十二世纪以来就开始向海外移民。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华人才开始成批地移民美国，这是由于美国当时开发西部，急需开垦金矿、修建铁路和开拓农业的大量劳动力。这种大规模的从中国进口劳工一直持续到 1882 年《排华法案》建立之后才停止⁴。当时，中国劳工，或者再宽泛一点说还有日本劳工，动摇了墨西哥农民在美国农业上的地位，一下子形成了强力的竞争对手。在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墨西哥和中国劳工几乎覆盖了美国西部和西南部的许多地方⁵。

许多华人移民并不像早期的墨西哥移民那么居无定所或者季节性地逗留，尽管他们也持同样的寄居者心态，主观上并不想永久定居下来，而是想尽快实现他们的“黄金梦”，然后衣锦还乡。但他们都不得不在美国停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了反抗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法律上的排斥，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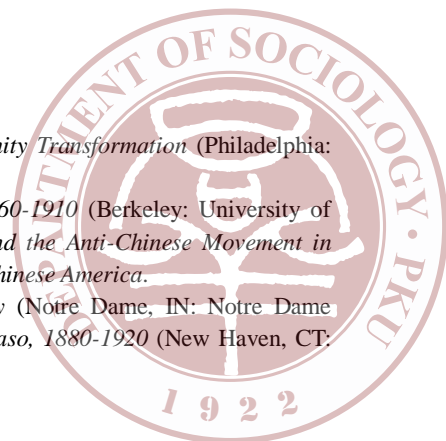
¹ Joffe-Block, “Immigration Viewed From the Other Side.”

² 2005 年，在墨西哥格雷罗进行的 CIOP 项目的田野调查。

³ Min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⁴ Sucheng Chan *This Bitter 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⁵ Mario Barrera, *Race and Class in the Southwest: A The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rio Garcia, *Desert Immigrants: The Mexicans of El Paso, 1880-192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大多聚集在大西岸和东北岸的大城市的贫穷社区中，为了生存一方面干着最卑贱的苦力活儿，另一方面也组织起来自治自助。这些族裔组织严密的单身汉社区是美国许多城市当代唐人街的雏形，尤其是在加州和纽约¹。

华人移民之所以有跨国主义研究的价值还在于移民来自特定的来源地。早期出去的华人移民并不是来自全中国各地的，而是主要来自两个南方省份——广东省和福建省。广东，既是中国人人口第二稠密的省份，也是华人移民的最大输出地。而且，广东还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唯一向美国输出移民的省份。其中超过一半的海外华人华裔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广东祖籍。移民到北美的主要广东省的五邑地区（现在的江门市）²，还有珠江三角洲周围的农村地区。福建在历史上是中国第二大移民输出地，约有九百万海外华人和华裔是福建籍的。福建移民美国比较广东移民晚，虽然十九世纪已有福建人来美，但人数众多的移民抵达美国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们当时大多都是通过所谓的“蛇头”偷渡过去美国的³。福建籍的北美移民主要来自连江、常乐、福清以及省会福州等地。

1. 传统的华裔社团组织

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二战之前，美国华人移民主要聚集在西岸的大城市唐人街以及其他主要城市，如纽约和芝加哥。因为《排华法》和种族歧视的缘故，华人社区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隔绝，但是他们并没有切断对于祖籍国政治与社会事务和家乡亲人的关心。当时大部分华裔人口是由第一代移民和男性劳工组成，在 1890 年代美国华人社会的男女比例是 27 比 1。这些人口中超过 60% 集中在加州，他们大多从事洗衣业、餐厅业、雪茄和靴子制造业、农业、家政业以及提供卑微的服务业⁴。他们依赖宗族社会网络建设族裔聚居社区——唐人街，在社会的夹缝中求生存。唐人街的产生是为了共同抵御无所不在的外在敌视，实现自给自足和自我管理。在老唐人街里，有三种主要的传统社团组织：宗亲会，会馆，以及商会（也俗称为堂会）⁵。

家庭和宗亲观念在早期华工中间尤为强烈。原因是许多华工来自同一村落，且由于不懂英语，人地两生，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唐人街遂成为各种不同宗亲会成立与发展的重要基地。这种宗亲关系和组织一直到排华阶段才逐渐得以制度化。宗亲会多以同一姓氏，血亲或宗族为核心。中国传统的家族概念本来就很宽泛。在美国，这一家族概念被进一步拓宽了，超出了同一姓氏、同一祖宗和同一村落的范围。只要姓氏相同，一般可称为同一宗族。因此许多宗亲会亦吸收一些非血亲或非同宗的成员。一些人数较少的姓氏甚至联合起来成立宗族组织以提供相互协助和对成员安全的保护。宗族组织的规模小到 20 至 100 人，大到几百至上万人。

地域性的会馆又称同乡会，一般比宗亲会规模要大，属于乡土或地域性组织。通常由来自同一地区，讲同一种方言的成员组成，并冠以移民来源地的省、县城镇及乡村的名字，如福建会馆、台山会馆、中山同乡会等。由于跨越了宗族和村落，会馆成员人数一般比宗亲会多。一些人数较少但方言相近的区域，往往联合起来组成较大的会馆。

堂会（又称帮会）与宗亲会和会馆有所不同。“堂”不以血缘，地缘和宗亲关系为基础，而重视结盟起誓，重义气和堂规。一些小的氏族和弱势群体为防止受到较大的宗亲会和同乡会的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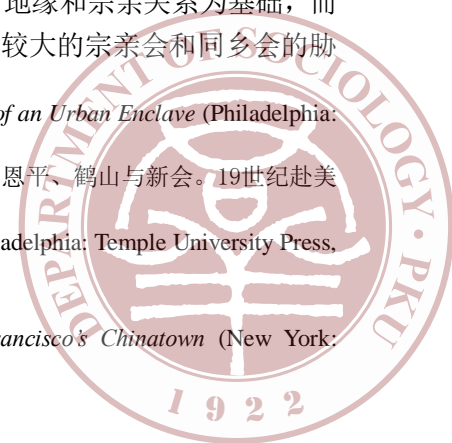
¹ Chan, *This Bitter Sweet Soil*; Min Zhou,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²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又称作五邑侨乡，包括了五个县级市：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与新会。19世纪赴美国的华工大多源于此地。

³ Ko-lin Chin, *Smuggled Chinese: Clandestin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⁴ Chan, *This Bitter Sweet Soil*;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⁵ Richard. H. Dillon, *The Hatchet Men: The Story of the Tong Wars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2).



迫，便自愿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更有力量的社团，称之为“堂”。堂会成员以兄长相称，对外英勇打斗，以维护堂会利益。堂会一般广招朋党，因而吸引一些小的氏族和弱势群体，以及各行业的业主和雇员，其内部的结构、人员、财力和活动隐秘，人多势众，且财力和武力均较为雄厚。堂会也担负商会的职能，在唐人街中自划地盘，控制社区内部的经济事务¹。最为著名的有萃胜工商会、安良工商会和协胜公会等。

老唐人街在十九世纪末中华会馆（CCBA）建立之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组织化生活。中华会馆的前身是著名的六宗亲团（the Six Companies），1880年后期出现于旧金山的唐人街。中华会馆扮演着族裔保护伞和唐人街自治“政府”的角色，将各宗亲会、同乡会和堂会联合起来²。每个唐人街都有中华会馆或叫中华公所。例如，1883年在纽约成立的中华公所联合了60个社团组织；洛杉矶中华会馆在1889年建立，联合了27个社团组织。中华会馆的主要功能有，调解内部纠纷和冲突，制定社团成员的行为规范，以及对外代表华人社区，为族裔群体和个人的权益与主流社会进行抗争。最近十几年来，这些中华会馆的成员各自都为其成立100周年办了庆祝活动。

因为美国的排华政策不允许女性移民，华人既无法携家眷移民也很难在美国本土成家，这就使得当时的华人归国之心和关切祖国之心更为强烈。尽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佳，但他们还是定期寄钱回家支持他们的父母和妻儿，并通过宗亲会与会馆，筹款资助家乡的建设。事业有成的商人也会经常往返中美两地，在家乡建房置地，投资产业和商业。因此，在二十世纪之初，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这种传统的跨国活动形式中。与此同时，中华会馆以及一些比较大的宗亲会，会馆和堂会都会积极参与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尤为突出的是筹款支持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皇朝——清朝。孙中山在青少年的时候随家人移居夏威夷，为了祖国的民主革命事业而放弃了医生职业，于1894年在檀香山建立了作为国民革命海外基地的兴中会³。

总而言之，在老唐人街内，谁也不可能忽视华人社团的存在，因为许多传统的社团组织在唐人街里拥有物业并声称拥有唐人街辖内路段的控制权。当今唐人街的主要中心地带，街道两旁都容易注意到刻有社团的名字的建筑楼宇，楼顶还挂着祖籍国的国旗（1980年以前大多挂中华民国国旗，1980后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社团不断地增多）。这些社团今天跟往日区别很大，其功能随祖籍国和接收国的大环境的变化而在不断的变化。

2. 新华裔移民社团组织

美国的华裔人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跌至八万五千人，而后几十年都一直徘徊在十万人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的局面直到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才得以改变。第一个事件是美国在1965年进行了移民法的重大改革，国会通过了《哈特-塞勒法案》，废除了1924年通过和实施的配额限制移民法，放宽移民入境，确立了以家庭团聚为主，技术人才移民为副的两大优惠政策。第二个事件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结果在中国再次引发了三十多年持续不减的移民潮，移民人数一直以几何递增的速度攀升，移民美国的华人人数从1960年代的十万增至1990年代的五十三万。美国华人的总人口也随之不断上升，从1960年的不足二十四万增至2010年的三百八十万。

但是跨二十一世纪初的移民潮不同于一个十九世纪的以华工为主的移民潮。虽然目前华人移民人口中仍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无证移民，而且主要来自福建农村，但当代华人移民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移民法许可的两个途径合法移民美国，一是由亲属担保的家庭团聚签证，二是由雇主担保的

¹ Ko-Lin Chin, *Chinatown Gangs: Extortion, Enterprise, and Ethni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Kwong, *The New Chinatown* (New York: Hill & Wang, 1987).

² Chia-ling Kuo,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New York's Chinatown: The Role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7).

³ Him Mark Lai,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AltaMira Press, 2004).



专业技术工作签证。新改革的移民政策不但允许移民的父母、配偶和子女移民取得移民签证，而且还强化了国际移民家庭链（family-chain），为移民美国开拓了新的渠道。与此同时，华人移民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就开始“脑力外流”，先是在二战后，继而是六十、七十年代从台湾流入美国，后来是八十年代以后从中国大陆流入¹。这种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潮经历了有三波。第一波脑力外流的人数相对较少，主要是由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外交人员构成。1949年国民政府战败迁都台湾，美国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当时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华人因此滞留，当时有几千人以战争难民的身份获得永久居留权。第二波脑力外流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间，主要由台湾人构成。当时国民党政府成大批地派送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美国的大学学习深造，还有不少中产阶级家庭送子女出国留学，他们学成以后大多数留在美国工作，通过雇主担保移民。第三波脑力外流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今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和美中建交后，中国政府放宽留学政策，大量向国外、尤其西方先进国家派送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1978至2008年间，中国派送超过将近80万留学生，其中有一半到了美国。还有不少自费留学生。但这些留学生当中仅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学成回国。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国会特许六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及其家属获得永久居留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美国国会进一步改革移民法，放宽了H-1B工作签证和技术移民，使美国公司雇佣高级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更为便利，这无疑又加速了移民输出国的脑力外流。举例说，2002年，美国发放了将近一万九千个H-1B签证给在美找到工作的硕士以上学历的中国留学生，同年有一万八千位中国籍的高精尖专家和技术人才获得永久居留权²。

与早期的华人移民不同，新移民体现了来源地、社会经济背景和居住地的多元化。当代的华人移民，不再限于来自广东的农民，也不仅仅限于来自社会经济底层的人士。他们抵达美国后也不再受困于唐人街，他们的定居模式多样，大多数在郊外的中产阶级社区落脚，还建立了华人聚居郊区（ethnoburbs）。新移民的华人组织生活当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华人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华人移民社团组织，这当中的许多社团组织是在老唐人街以外成立的。

3. 跨国华人移民社团

美国华人社团的发展非常快，但是目前尚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数字。最近我在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这几个华人移民的主要聚居城市所进行的一项移民跨国活动研究，编辑了一个华人社团清单。这个清单是根据这三大城市所在的中文电话黄页、社团网页以及与中国政府和使领馆的访谈中收集的，总共有 1370 个社团，是一个不太完整的清单（如表三所示）。据中国领馆官员的估计，光南加州的华人社团组织就超过两千个，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虽然搜集有限，但是表三已经反映了各种类型的华人移民组织，其中包括规模最大的、历史最长以及最稳定的社团。

如表三所示，传统类型的社团组织诸如宗亲会、会馆和堂会占社团总数的 40%，依然是当代华人移民社团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地域性会馆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许多会馆已经超越了宗族和村落的地理界限，将不同地区甚至不同省份的成员也囊括进来。除此之外，不少现代类型的社团组织正急速发展。譬如，专业团体占总数的 11%。例如，美国的华人科技协会（国家级的，拥有 15 个地区分会），华美医师协会（纽约为总部，分布在新英格兰、加州、芝加哥和休斯顿），华人软件工作者协会（加州硅谷），南加州华裔教授学者协会（洛杉矶）等等。当代华人移民的职业结构呈多元化，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比例，尤其在高科技领域更是出类拔萃，华人社团又快又多且活动频繁。华人专业团体一般属于向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登记注册、正式成立的非营

¹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en G. Rumbaut,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3rd e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² Portes and Rumbaut, *Immigrant America*.



利组织，通常都有自己的网页。他们会在上面发布各领域的信息，如科学，工程设计，医学和财经。这些社团成员从几十到几千人不等。许多专业社团是跨国的，跟家乡政府部门，不管是国家级、省级还是地区级的，都有较密切的关系。他们也会分别在美国和中国举办年会或其它会议。

表三：美国三大华人聚居城市在册华人社团统计（2009年）

种类	数量	百分比
传统宗亲会、同乡会、堂会	546	40
专业协会	146	11
校友会	142	10
文化组织	195	14
商会	74	5
政治组织	83	6
宗教组织	63	5
文体娱乐团体	66	5
社会服务组织	38	3
教育组织	17	1
总计	1370	100

资料来源：移民社团比较研究：中国部分。

校友会的发展也是华人社团的一大亮点，与传统的华人社团组织不同，校友会大多是以中国高等院校为单位成立的，很少以中国中、小学为单位成立的，这反映了当代华人移民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过去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农村，教育程度较低，许多人连中学都没念，二战前美国的华人社会也有校友会，但为数不多，那些校友会多数是以来源地的乡小学或县中学为基础的。新型的校友会旨在建立成员网络并且在成员中交换信息，他们的跨国活动主要是去支持各自的母校。

新发展的华人社团组织中还包括各类的商会，与过去唐人街的堂会不同的是，新的商会依赖传统的网络和跨国活动去开拓他们的事业。这些民间的商业社团组织大多参与跨国活动，且在中国的活动范围较为广泛，他们意欲与美国经济政治融合。受访的侨领指出，他们站在全球经济的前沿，将自身视作“变革的推动者”（agents of change），并作为美国“通往太平洋沿岸的大门”而存在。这些商业社团组织希望能够促进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的团结与交流，不仅是出于经济原因，也旨在保留和崇扬中华文化。

从表三这份清单中，我们挑选了其中 55 个知名度高，信誉卓著而且有定时活动的社团组织作为访谈对象，挑选的标准是基于两个假设，一是这些社团组织的规模一般有较强的能力与祖籍国的地方和中央政府建立对话，并参与跨国活动。二是这些社团的侨领一般有良好的信息渠道，熟悉本社团的特点与情况以及所在地其他社团的情况。我们以电话和面谈方式对这些社团的侨领进行了访谈，经过资料的汇总和分析，我们可总结出几个有意义的发现。第一，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社团具跨国的特征，与祖国家乡的各级政府保持联系；也有些社团组织更是为了跨国这个目的而建立的。第二，尽管跨国社团众多，但真正跨国的频率和活动内容各有很大差异。第三，跨国社团的成员不一定直接参与跨国行动，真正参与的社团成员仅占少数。一般说来，直接参与跨国行动者以已婚，已入美国籍，并在事业上已有所成就的男性中年成员为多。第四，跨国社团组织的跨国活动的影响有实质性的意义的，也有象征性意义的。

从实质性的层面看，华人移民社团组织的主要影响在于帮助移民适应和融入新家园的生活，进而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具体的说，社团组织为成员提供联谊的场所和机会，帮助成员建立社会网络，保持和重建与祖国和家乡的联系。这种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也间接的帮助移民创造和积累金融和人力资本。华人移民都有他们各自的“美国梦”，如拥有自己的住房，自己当老板，送子

女上名校，要圆这些梦不能光靠个人的努力，还需要丰富的社区资源。多种多样民间社团的产生不仅强化了华人社会的创造了良好的社区族裔环境。此外，跨国移民社团还协助成员在祖籍国寻找商机和更好的就业机会，协助成员为祖国经济发展做贡献，协助成员为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出力。从这个意义上，社团组织的跨国活动也可以理解为帮助移民立足美国，落地生根。从象征性的层面看，社团组织为成员提供了体现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平台。例如，侨领的身份不仅得到新家园社区的认可，也得到祖籍国各级政府的认可。

4. 祖籍国的影响

1976 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逐渐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政府 1978 年开始实施经济改革开放的国策，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简称“国侨办”）以及相应的各省市的侨务办公室随之重新恢复其职能。从前对海外华侨华人不信任，将其视作潜在的特务或叛国者，现在则欢迎他们回国投资、置业和创业，并将其视作经济改革“支持者”、“推动者”和“先锋”¹。1989 年 5 月，国务院重申了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经济尤其在引进外资和先进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还放宽了留学生政策，从八十年代严格要求留学生回国到九十年代鼓励留学生来去自由，认为归国不是“报效祖国”的唯一途径²。

与此同时，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侨联”）也在文革后重新恢复。侨联于五十年代初成立，是与侨办平行、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群众组织。侨办和侨联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了相应的办公室，里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领国家薪水的公务员，他们的职责是处理与世界各地华侨华人及其在华亲属的有关事务，并与海外华人移民社团密切联系以促进华侨华人的跨国活动。除了在本国做好侨务工作，中国各级侨办和侨联的官员会定期到美国访问，加强与美国华人社会的双向联系，而这些访问活动一般由美国各个城市主要华人移民社团组织及其侨领来协调和接待。在每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月一日的国庆日，中国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和四个领事馆（纽约、三藩市、洛杉矶和休斯顿）举行庆祝活动，设宴招待各界人士，其中包括华人移民社团组织的侨领、华裔企业家和专业人士。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持续增长，也导致国家侨务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从八十年代强调引资和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强调引智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海外华人的投资跨越地域的局限，从家乡向外围地区以及扩展，特别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带动了沿海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和国家为了维持这种发展趋势，通过各级侨务部门的通力合作，定期出资举办各类专业性和商业性招商引资引智会议，各级党政领导人还亲自会见与会代表；还出资在中国和海外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各级侨办举行海外华人青少年夏冬令营，还有被政府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工作”的汉语培训项目。如海外孔子学院，到 2010 年六月，在美国的 37 个州已经成立了 64 所孔子学院，而 2005 年全美只有一所³。国家的介入大大加强了海外移民社团组织的网络关系，一方面支持华人社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鼓励移民落地生根融入接收国主流社会，另一方面促进海外华人社会之间及其与祖籍国之间的科技与文化的交流。总之，近年来祖籍国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不仅提升了国家形象，也有效地促进海外移民的跨国活动，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5. 变动中的华人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

与墨西哥裔移民社团一样，围绕着祖籍国国家和政党两条主线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制度，与海

¹ 见<http://qwgyzj.gqb.gov.cn/qwhg/146/1346.shtml>（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浏览）。

² 见<http://202.205.177.9/edoas/en/level3.jsp?tablename=1242702622613408&infolid=1253167200778185>（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浏览）。

³ Michael Chiu, “Map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the U. S.” *US-China Toda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osted on June 8, 2010). [http://www.uschina.usc.edu/article@usct?map_of_confucius_institutes_in_the_u_s_14774.aspx] Access on May 1, 2011.



外各种类型的华人移民社团组织交织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有形而又有效的跨国网络，影响着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跨国移民社团对祖籍国的贡献除了传统的国际汇款和捐赠，近年来形成了些新模式。一般说来，新模式更多的是社团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而华人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也大多是以组织的形式或通过社团来进行的。同乡会、专业团体协会和校友会和其他民间组织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家乡在经济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其他方面，尤其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和慈善事业等方面，如救灾扶贫，修路建桥、修建学校、儿童和老人文化活动中心，还兴办大学。广东省江门市的五邑大学就是由美国、加拿大、东南亚和港澳侨胞集资兴建的。五邑大学其中一栋主楼叫“十友楼”，如其名，是由十位海外华商出资而建¹。

移民跨国社团对家乡的影响，以往集中在为家乡修路，修桥，办学。现在则更为重视家乡的文化建设，如捐赠村委会办公大楼和公共文化设施，包括文化中心，图书馆，博物馆，老人中心，公园，还有寺庙和祠堂以及文化象征物（门楼、雕像、纪念碑等等）。移民社团的影响还超出“家”和“乡”。例如，社团帮助成员投资祖国经济建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投资高科技产业以及以智能资本为基础的专业行业（如高科技研发，高等教育，商贸中介，教育中介等）。当然，美国华人社团的跨国活动受祖籍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也与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的改变和强有力的物质支持分不开的。

总之，华人社团是美国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华人社会创造和积累族裔资本（包括社会、人力和金融资本）、帮助移民打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结构基础。其主要功能乃受祖籍国和接受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华人社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今美国华人移民的跨国活动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组织行为，对组织来说，跨国社团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成员落地生根，而不是落叶归根，个人可以通过组织参与跨国活动，为自己社会上向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提供多一条有效的替代途径。

六、讨论：比较墨西哥和中国跨国主义社团组织

表四显示了墨西哥和中国两国及其在美的移民社会的背景特征，为我们以下的讨论提供依据。如同雄鹰与巨龙，这两个移民大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国政府对各自侨胞的态度都有过较大的转变——从怀疑和视之为敌到信任和视之为友并积极地培养他们对祖籍国的热爱与忠诚。这种态度的转变在中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国家以及各主要省市地方级的侨办和侨联的重新运作，首先重新落实了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华侨政策，把过去没收和占有的房产财产回归侨眷，鼓励海外华人华侨回乡探亲和投资。在墨西哥对移民态度的转变发生在九十年代初，联邦和地方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政策，鼓励旅美墨西哥裔移民回国作贡献。福克斯（Fox）总统上台后，积极为旅美的墨西哥裔移民来往两国提供服务和便利，在2002年建立了IME移民事务咨询委员会，将这种积极态度变为行动，将有利与移民的政策转变推向高峰²。

值得注意的是，中墨两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刻意地去创造一种跨国场域。这种跨国场域一般是由移民自身与家乡亲友的密切联系而自发形成并以各种复杂的形式存在着的。但是，政府的介入却极大地扩展了这种跨国场域的范围，强化了它的作用，并扩大了它对祖籍国发展的影响。两国政府都从各自的侨胞对于热爱家乡的情结中和为家乡作贡献的意愿中获得了利益，从而间接地促进了数以千计的移民社团，因为政府一般与社团打交道。从分类的层面上

¹ 位于江门的五邑大学是海外华人出资建成的。该大学于2010年9月举行了一个关于“国际移民视野下的海外华人与侨乡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会址设在“十友楼”（Ten Friends Building）。顾名思义，十友楼是由旅居香港的十位五邑乡亲同心发起，捐资港币一千万元兴建的。五邑大学的“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也设在此楼。

² Escobar, “Migracion y Derechos Ciudadanos”; Natasha Iskander, *Creative State: Forty Years of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in Morocco and Mexico*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看，华人社团的种类繁多，有传统的宗亲会、同乡会、地域性会馆和专业行业协会。而墨西哥裔的社团则以同乡会为主，近年大量涌现的社团也有相当数量的同乡会。正如艾斯科芭提到：

“在美国，墨西哥裔移民社团组织的一个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社团成员大部分来自农村，所以他们的组织类别几乎全都是同乡会 (hometown associations)。这些社团的组织形式大都仿效了来源地的乡或村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¹。

表四：中墨两国及其在美的移民社会的背景特征

祖籍国	中国	墨西哥
人口（2009年）	13.4 亿	10.6 亿
城市人口比例	42%	67%
人均寿命	74.5 岁	77.4 岁
人均国民总收入（2008年）	3300 美元	14400 美元
Gini 不平等指数	.47	.47
教育水平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25-64岁成年人）	3%	16%
高中毕业学历	9%	33%
失业率（2007年）	7%	3%
成年人就业人口比例	62%	63%
首都	北京市	墨西哥市
美国	华裔移民社会	墨西哥裔移民社会
国外出生的族裔人口（2008年）	360 万	1270 万
2008 年度获永久居民身份的移民人数	80271	189989
占 2008 年度全美永久居民身份的移民人数的百分比	7%	17%
移民总人数排位（2008年）	第二位	第一位
在业人口中持专业职位的比例	52%	5%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25-64岁成年人）	50%	6%
家庭年收入中位数（2008年）	66118 美元	36004 美元
贫困家庭比例	12%	22%
移民合法身份	大多数合法，少数无证移民	合法和无证移民比例相当
三大移民聚居城市	纽约，三藩市，洛杉矶	洛杉矶，芝加哥，休士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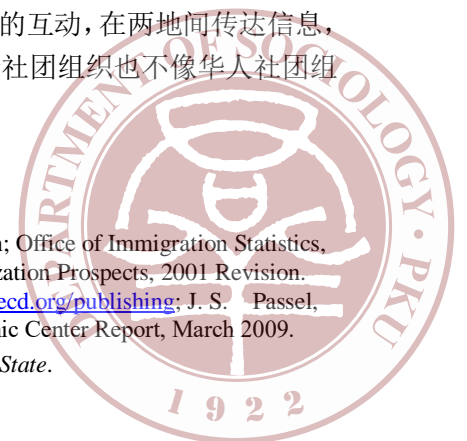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人口统计局，国安局²。

在社团组织的更高层次上，两国移民群体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华人移民的社团组织大多实行自治运作和管理模式，这些社团一般都有丰富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如中华会馆及其下属组织，各类宗亲会和同乡会，还有许多现代的专业团体、商业协会和校友会都是如此，相对独立于祖籍国政府的控制。可是，自治运作和管理模式在墨西哥移民中比较少，尽管他们在美国的人口众多，他们的社团大多是以乡为主的同乡会，规模较小，资源贫乏。同乡会联盟虽然是移民社团组织中较高级的组织形式，但是联合会或同乡会联盟的建立很多时候都是在祖籍国的支持和领导下成立的³，这些移民社团联盟一般没有任何形式的自治运作，因为他们受制于墨西哥政府，实际上主要功能在于辅助祖籍国政府与海外移民社会的互动，在两地间传达信息，交流对话。此外，墨西哥移民中的专业团体寥寥无几，其他现代的新社团组织也不像华人社团组织那样有深度和广度，成员也不多（见表一和表三）。

¹ Escobar, “Migracion y Derechos Ciudadanos.”

²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03; Public Use Micro data, 2000 Census of Population; 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Dep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08 Annual Report;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2001 Revision. New York: 2002; OECD Observer, *OECD in Figures 2009*, Supplement #1, www.oecd.org/publishing; J. S. Passel, “The Economic Downturn and Immigration Trends,” Washington D.C.: Pew Hispanic Center Report, March 2009.

³ Goldring, “The Mexican State and Transmigrant Organizations”; Iskander, *Creative State*.



两国移民社团组织的差异不仅充分地反映了两国移民群体在人口素质上的差异（见表四），还预示着祖籍国政府与海外移民社团互动模式的差异。在这方面，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与侨胞和社团的互动中处于一个较佳的位置，因为移民及其社团相对独立，对祖籍国政府不存在很强的依赖性。他们不仅有丰富资源，还享有合法的移民和公民身份，受接收国法律的保护。而墨西哥裔移民社会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低技能农民背景的非合法移民，在接收国没有公民的地位和权利。因此移民对祖籍国的依赖性比较强。为了更好地与移民沟通和帮助移民，墨西哥政府的介入比较直接、更加积极主动，不仅投入的有形资源更多，而且体现在更多的方面，包括实施“1+3”项目（tres-por-uno program）来鼓励移民为家乡多做慈善和其他福利事业，出资在接收国建立社区学堂（plazas comunitarias）为移民及其后裔提供英语、西班牙语以及高中课程的学习和培训，还给无证移民颁发一种特殊的身份证（matricula consular）以方便他们在接收国的生活（譬如他们可持这种特殊的身份证到美国的某些银行开户）。而中国政府不需要采取这种直接的鼓励措施，除了孔子学院的语言培训外，北美华人移民一般都不需要这类服务，因为大部分华人移民受过良好教育，在美国拥有合法身份和多元的职业。即使同是语言培训也存在很大差异，墨西哥的做法是给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移民教授基本的英文读写技能，而中国的孔子学院的宗旨是向土生土长的华人和外国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

中国政府的介入更多的是辅助，其主要目的不在仅仅在于引资引智，还在于通过强化海外华人和侨胞的爱国之心以及培养与颂扬他们拥有的共同文化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¹。后者是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比如在出资协办世界同乡会恳亲大会和各类国际华人专业年会，主办节日庆典和宴会，资助国家文艺团体出国为侨胞表演，在权威大会上颁发奖项给著名的科学家、企业家和侨领等等。由于华人移民社团组织和中国政府都不是急切需要金钱上的交换，因此荣誉与认同日益成为跨国交流中的“无形财富”。

不过中墨两个国家也存在着相同之处，那就是祖籍国和海外移民社会的合作受到各自共同利益的推动，这种共同利益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社会地位方面的。对政府而言，移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通过个人汇款、投资以及组织化的慈善活动对祖籍国经济发展做贡献，而且他们也同样是“祖国在海外的脸面”，能够帮助祖籍国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形象与获得相应的地位。而对于移民尤其是移民社团组织的侨领而言，来自祖籍国政府的赏识进一步凸显了他们所在社区和社团组织以及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与合法性。例如许多移民出国之前在家乡默默无闻，并没有受到社会的关注，但可以他们在跨国场域中可以通过社团的领导人的身份或社区侨领的身份在家乡成为受人尊敬、有显赫社会地位的大人物。这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既导致了更多新跨国移民社团组织的涌现，也加强了已有移民社团组织的扩展和团结。

七、结论

如文章的开头所述，以往研究发展学的文献很少关注国际移民跨国活动这一社会现象。即使是现存的有关研究，大体都围绕如下一些主题展开，例如国际移民是国家不发达的原因，或者是结果——国际移民导致输出地区的人口骤降和精英人才的流失和脑力枯竭以及经济衰退²。不过，大量的移民国际汇款改变了这些观点，因为国际汇款可以减轻祖籍国的贫穷状况，提高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也随大流地认为移民国际汇款的潜力有如未开发的

¹ Min Zhou, “Traversing Ancestral and New Homelands: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metown Development in China.” Final project report (Center fo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0).

² 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Lucie Cheng and Edna Bonacich, *Labor 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Sergio Diaz-Briquets and Sidney Weintraub,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Mexico and Caribbean Basin Countri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金矿，认为这些汇款大大地有利于融资，办开发经济项目，以此取代为数不多的国际援助。移民输出国的学界趋向于前一种观点，强调移民出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认为国际移民会造成输出地人口和经济的大幅下降，而且指出国际汇款可能会让祖籍国政府和社会精英推卸消除本国贫穷现状的责任。因此，移民输出国只会强化了社会不平等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而且让国家经济发展滞后，并不能够帮助国家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不发达的问题¹。

一个更为折中的观点则认为，国际移民是否带来负面或正面的后果，依赖于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移民输出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财政实力以及移民类型。永久迁移型的国际移民总体上确实存在着很多负面后果，因为它可以导致输出地人口的严重下降以及人才流失。此外，永久迁移型的国际移民一般举家迁移，其往家乡汇款的动机就不复存在了。而循环迁移型的国际移民则会带来相反的结果，他们会透过定期的跨国活动把资金、信息和技能带回家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输出地政府的积极态度和实际支持，就能够将这些资金和技术用于更合适的渠道，以利家乡发展²。不过，也有部分移民会重返祖国。一般的解释是因为海归者觉得他们在国外的就业机会不佳，或者在那里的生活不如意。在这种情形下，输出国政府很难扭转人才流失的现象，因为较难说服海外侨胞中的佼佼者永久归国³。

进入跨国主义时代后，情况就有所不同。海外移民跨国社团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表明，即使是举家迁移、在国外永久定居的同胞一般都不会完全放弃他们跟祖籍国的联系。如上所述，那些在接收国已经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那些经济上和法律上都得到保障的移民，更倾向于参与跨国活动。现今交通工具的发达和便利，使永久迁移型的国际移民定期往返祖籍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不仅扩展了跨国场域，也有利于他们在跨国场域中施展，使他们身在国外也会参与到祖籍国家乡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来，并为祖籍国汇入有形和无形的宝贵资源。

像墨西哥和中国这样具有敏锐嗅觉的政府早已发现移民跨国主义实践的潜力，所以现今的政府放弃了期望和说服具备专业技术和高级管理经验的人才归国，而积极地鼓励他们（连同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建立和参加跨国社团组织和参与跨国活动。从移民群体的规模上考虑，海外移民的跨国活动所带来的发展潜力是很显著的。如前所述，墨西哥侨乡数以百计的公共事业项目都是来自移民的捐赠。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海外华人的投资是影响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比较两个国家，中国显然拥有更多的优势，因为美国华人移民人口的社会阶层类别更为多样化，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技术人才与企业精英。可以说，中国政府是当代第一个祖籍国加入这种跨国场域的，移民的跨国关系可以在拥有众多资源的中国政府的积极辅助下和移民社团组织的带动下得以有效地培植，并在实践中通过制度将旅居国外的专业技术人才与企业精英往返家乡的行动固定下来。

当然，美国的墨西哥裔移民社团组织有着巨大的潜力还未开发。在绝对人口数量上，在美国的墨西哥裔的人口相当于或者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小国家的人口，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有如巨龙的墨西哥可以利用人口的巨大潜力来改善其侨胞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推动家乡的经济发展。比如，墨西哥裔移民中的专业技术人才的绝对人数也是很可观的，尽管他们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被平均数给淹没了。墨西哥还可以组织和引导墨西哥裔移民的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到家乡的科

¹ Raul Delgado-Wise and James M. Cypher, "The Strategic Role of Mexican Labor under NAFTA: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Economic Integr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610 (2007): 120-142; Stephen Castles, "Understanding Global Migration: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 (2010): 1565-1586.

² Massey et al., *Beyond Smoke and Mirrors*; Alejandro Port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conciling Opposite View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2 (2009): 5-22.

³ Diaz-Briquets and Weintraub,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Mexico and Caribbean Basin Countries*; Cheng and Bonacich, *Labor 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学、教育以及慈善活动中。总而言之，发展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不应该继续把国际移民看成是一个国家落后的标志，也不能低估国际移民汇款和其他正常的跨国活动的作用，更不能忽视跨国社团组织日益复杂的网络以及他们与国家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在任何关于移民祖籍国发展的研究中，我们高度重视移民社团组织的重要性。墨西哥和中国，都正在用各自的方式显示出这种组织的潜力是如何被开发出来的。

【论 文】

中国新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挑战、制度限制和社会支持 ——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1]

周敏^[2]，王君^[3]

【摘要】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教育。教育被认为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无论身处西方或东方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子女教育问题对于中国新移民家庭来说都是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的比较分析显示，美国华人家庭面临着种族歧视的结构障碍以及文化和代际的双重冲突，新移民除了依靠自身能力和经济社会背景，还通过华人社区的社会支持机制来缓解家庭内部的矛盾和代际冲突，使移民子女取得教育的成功。而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新加坡，择优录取的教育制度和中国的应试教育有很多相同之处，中国新移民在子女教育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制度和结构而引致的机会缺失，他们更多依靠自身的移民的超高端筛选，充分利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跨国家庭资源应对新加坡的考试制度和过早分流带来的激烈竞争和焦虑。本项研究的结论是，海外华人移民子女教育的成功，除了新移民由于超高端筛选而有较高起点这个因素外，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有重教育的儒家文化和虎妈式的严管良教，还与多层面的移出环境和移入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和社会支持机制密不可分。

【关键词】中国新移民，超高端筛选，教育期望，文化冲突，代沟，族裔资本

一、引言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教育。传统的中国社会重视读书，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贫苦出身的读书人可以靠自己的才学和“十年寒窗苦”，通过科举制度走上仕途，光宗耀祖。现代的中国社会也同样重视教育，视教育为取得薪酬优厚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社会地位的阶梯。中国当今的高考制度，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使成千上万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通过考试被大学择优录取，为他们实现个人的职业梦想铺平了道路。在中国，教育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是父母养育孩子最重要的责任。子女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是衡量父母社会地位的标准之一，也

¹ 本文曾刊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1至9页。

² 周敏（Min ZHOU），社会学博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中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³ 王君（Jun WANG），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